

漠北回鹘汗国“国人”会议制度初探

马 军 林 欢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1)

[摘 要] 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诸政权一样,漠北回鹘汗国的内部存在着实力强大、左右汗国政局的“国人”集团。“国人”通过集会的形式来决定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应该逐渐走向灭亡的“国人”势力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依靠与吐蕃的战争中的军队继续得到强化,进而产生了“相”大权独揽的情况。

[关键词] 漠北回鹘汗国 “国人”会议 “相” 灭亡原因

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漠北回鹘汗国灭亡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目前基本的观点都认为汗国的灭亡在于内乱的频繁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然而关于引起内乱发生情况的根源问题还没有人进行深入地探讨。故而本文以漠北回鹘汗国的“国人”会议体制为研究对象,试图了解“国人”会议在汗国内部的起源、构成、职能、作用、影响等基本内容,进而探讨“国人”体制对于汗国衰亡的影响。

一、“国人”会议的溯源

回鹘汗国时期存在着拥有左右政局、废立可汗等巨大权力的“国人”集团。“国人”又称“贵人”。回鹘汗国的贵族通过特定的会议形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做出一些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各种决议。尽管目前已知史书上并没有“国人”会议的直接记载,但是“国人推……”、“国人立……”等字眼屡见不鲜,另外在古代突厥文《铁尔痕碑》(《磨延啜第二碑》)碑铭第二石北面第11-12行中,出现了“……有(这些人)出席……”的记载。可见,“国人”会议制度是有可能在漠北回鹘汗国实行的。

“国人”会议制度在匈奴时代发展地已经较为完备,当时被称为“龙会”或“庭会”,它当承自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的贵族议事会,与“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宫室”的游牧生活相适应,故在后世诸游牧民族中沿用不辍。匈奴贵族们在一年之中三次集于单于庭(龙城、蹕林),商议国事。因为《史记》将这些贵族称为“国人”,所以这种集会被称为国人会议或贵族大会。国人会议除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内容外,还可以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随时举行。

二、设立原因

1.军事扩张。回鹘部的“国人”成员是行政官员与军事首长的结合。由于早期的部落联盟以军事战争为首要职能,因此可汗作为最高的军事首领直辖中央,而由大、小“国人”分主全国,战时分师所辖部众出征作战。早在后突厥汗国末世权力角逐中,骨力裴罗便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权术。他先从阿史那施起兵,然后取得东部“叶护”的高位,然后先后击败判阙特勤、乌苏米施可汗以及仆固、同罗两大漠北强部,又与葛逻禄联合倒戈击败阿史那施。接着又同葛逻禄争雄漠北,并逐之西迁。进而于745年击杀了后突厥汗国最后一任正统可汗,从而结束了突厥贵族阿史那氏的长期统治,实现了回鹘汗国对漠北的统一。

2.政治妥协。随着疆域扩大,地方势力相应增强,回鹘汗国的核心统治集团为了协调各部的关系,便于统治,于是采取了属于统治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回鹘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体。尽管回鹘迅速统有其他铁勒诸部,但是并没有打乱这些部落的基本社会结构,因此被兼并的部落没有丧失其原有的独立性。由于加入了回鹘的铁勒诸部首领依然保持原有的军事、政治势力。

3.传统分封制的沿袭。“国人”体制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传统分封制的实施,它由于适应了游牧经济的特殊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家产制观念,长期以来在北方草原上盛行不衰。回鹘政权是因军事、政治关系而形成的大联盟国家。虽然其名号统一在回鹘之下,但是其内部的地方性、独立性依然非常明显,无法形成类似于中原农业王朝为特征的郡县制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故而可汗需要对每个地方利益集团乃至部落的利益集体的根本统治力量都需要得到确认和满足,这才能够换取这些部落集团对新兴核心部落联盟的认同和拥护。

因而回鹘的可汗仍然与匈奴单于、突厥可汗一样,要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对各个部族首领拥有的地位加以承认,并且在此基础上取得各部首领对于大汗地位及其所部落联盟的承认和追随,而爵位官制正是对这种“滚雪球”类型国家政权的表现。

三、“国人”的构成

(一)巫师

所谓“巫师”,应该是当时在回鹘国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萨满教神职人员,他们在人、神之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因此在早期的国家祭祀活动兼“国人”会议中,巫师的身影应该是常见的。例如在神话《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回鹘人的可汗乌古斯身边有一位名叫“乌鲁克·吐鲁克”的萨满巫师,能够给可汗传达上天的启示。可见萨满神明与巫师的作用之大。

(二)可汗的近支亲族与异姓贵族

1.可汗的近支亲族。可汗的近亲在“国人”中居于主要地位。例如《铁尔痕碑》(《磨延啜第二碑》)第二石在北面第11-12行有:

“啊,我的汗,有(这些人)出席:我天(可)汗的骑士(“高贵人士”),九姓鞑靼,十七阿热梅禄,同罗部的将军和队伍,回鹘人民及我的诸特勤,当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护卫军首领勇敢的阿塔楚克及别克泽克·艾尔·刺史连同莫贺达干和三千护卫军。(以及)我天(可)汗之子毗伽达干和骨咄禄·毗伽·叶护……草原贵人……(属于)叶护的人民。”

第二石在南面第28行又有:

“之后,……三姓葛逻禄于猪年,九姓鞑靼……九梅禄……五将军,全体普通人民请求我父可汗土里燕即位为汗,‘这是祖先的意愿!’——他们说。”

按照耿世民先生的考证,其中的“骨咄禄·毗伽·叶护”即当年率军南下中原帮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的“太子叶护”,由此可知,这次大会是由葛勒可汗的众位近亲贵族代表“我的诸特勤”和异姓贵族(包括拔野古、同罗部、三姓葛逻禄、九姓鞑靼等首领)联合参加的一次重要盟会。

2.异姓贵族。史书上关于“都督”的记载很多,其由来似乎与唐朝在漠北设立羁縻府州,并将中原官制推广到漠北有关。其时,包括“都督”在内的唐朝羁縻官员根据自己部落的大小而享受着不同的政治待遇^①,即便是到了真正统一了漠北的回鹘汗国建立之后,“都督”们所享有的这种象征性的政治待遇依然没有多少改变。究其原因,在于汗国形成期间军事联盟的不断扩大与发展。这个联盟的扩大过程,便是回鹘部与异姓贵族们不断妥协、斗争的结果。到了汗国中后期,粟特人也加入“国人”的行列,从而为汗国后期的政治斗争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四、国人会议的运作

按照一般规律,回鹘的国人会议都要在每年的初夏季节举行,其主要作用在于处理军国大事。例如在《磨延啜碑》东面第20行:“四月初九日……我在(qasar 西方)那里祭了天”;南面第26行:“我在铁兹河源,在我的汗廷那里过夏,在那里我划定了疆界,作了祭祀。”与此记载相一致的又有《铁兹碑》的南面第19行:“他驻蹕于铁兹河源和葛萨堡,并在那里建筑了围墙,建立了汗廷,度过了夏天”。然而在实际上这种会议并不一定是每年一次,在遇有重大事件时,均须召开,商讨解决办法。在汗国内外出现突发重大事件的情况下,也要召

开国会议,这种会议由“相”召集。例如汗国被黠戛斯人攻破之后,乌介特勤于开成五年(840)八月被推立为可汗。这说明国人会议在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也可以在初秋召开,国人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人”会议运作的独立性和制度化运作为汗国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它使得整个汗国乃至可汗的继承、大政方针、对外关系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泾阳之盟中,郭子仪单人退兵的实际一直被中原汉人当作传奇故事而提及。许多人津津乐道于郭子仪的个人魅力,认为正是由于郭子仪大无谓的英雄气概镇住了回鹘兵马。但是当我们从回鹘的角度再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突然会发现事出有因,其决定因素就在于“相”们拥有集体举兵和退兵决议的权力。带兵主帅在战场上拥有决策权,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晓在回鹘大营中有五个宰相,真正使得回鹘退兵的原因联系回鹘“国人”会议的作用。由于回鹘军中之在此之前盛传着“唐天子南走,公见废”的流言,故而回鹘人在见到郭子仪后便不禁对于仆固怀恩的话产生了怀疑。于是能够与郭子仪进行会盟。在会盟之前,必定在回鹘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磋商。而此时,我们似乎看不到可汗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以“相”为代表的达干阶层掌握了重兵,因而使得他们对汗国的最高统治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使得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对于可汗宝座的相互争夺显得也异常激烈。

“国人”会议的另一项重要议题是新可汗的推举。按照现有史料的记载,在可汗的继承上,回鹘已经确立了类似中原王朝的那种嫡长子继承制,同时还在实行草原传统的世选制,即可汗的继承人优先在“药葛罗氏”的子孙中世选。在先可汗已经死亡、新可汗尚未即位的情况下,一般由众“相”负责召集,商讨新可汗的人选和处理先可汗的后事,行使监国之责。特别是发生了前可汗突发死亡事件的时候,由于前可汗的继承者或权臣还在遥远的地方征战驻防,还不知可汗庭所发生的事件,需要有人负责向他们传递消息,处理善后事宜。在这种情况下,辅佐可汗的用事大臣(可能就是大相、次相)自然担当此任,因此处理先可汗的后事、选立新可汗的贵族会议就多由用事大臣来召集。综观回鹘历史,不乏“大相”成为汗位继承人的例子。原因是在于大相在政治、军事上的超凡能力,加之政治野心,使得汗位被玩弄于自己股掌之上。从这种角度来说,“大相”是和非正常的储君相联系的。但不管怎样,即便可汗的血统发生改变,但是在表面上仍然以“药罗葛”氏为旗号。

(上接第40页)治策略上说,尽管革命党与维新派在变革中国政治的途径、手段上,有很大分歧,但在反对腐败的清政府和变专制为宪政的问题上,他们显然存在着利害上的一致性,所以存在着联盟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孙中山对此完全没有认识,竟把康梁视为第一大敌。梁启超虽然有所认识,但受师友牵制,加以派别利害上的考虑毕竟太重,亦终不能有所作为。……两党的分裂,只能是对清政府有利。革命和革新的力量很长时期不能统整,对旧势力不能取得明显优势,不但延续了清朝的生命,而且在清王朝倒台后,中国的政治迟迟不能真正走上革新的大道。所以可以说,革命党与维新党的决裂,孙中山与梁启超得分手,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憾事。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分裂深表遗憾,当时他在写给友人吴君遂的信中说:“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为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谓然!”^[1]。此时的梁启超认为,要改变中国积弱的状况,“必非恃一时之贤君良相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符。……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梁认为简单的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落后问题,并旁征博引,找出大量古今中外由于暴力革命导致国家分裂、人民颠沛流离的例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的去分析,梁虽反对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毕竟向当权者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变革。清末实行的一些立宪变革便是实证。最最关键是如何使革命不为少数人所利用,成为夺权的工具,改朝换代的方式,成为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巨大

注释:

- ①冯家昇、程朔洛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第2版[M],民族出版社,1981:37;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2;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M],民族出版社,1985:61;[韩]丁载勋《回鹘汗国灭亡原因新探》[J],文史哲,2001,(6)。
- ②③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208-210。
- ④“其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黄金为文,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器赐之。”《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 ⑤“开元中有九部落,置都督十一人。代宗时遣使册命可汗及其妻可敦,并封左、右杀胡禄都督拔览将军,内外宰相已下”(《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官号》)。“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册回纥可汗为登里可敦,登密施舍俱禄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册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可汗、可敦及左右内外宰相已下,共加实封二千户。令御史大夫王翊持节就牙帐礼册左、右杀胡禄都督等,并封为王。诸都督十一人,并封国公。”《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
- ⑥“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健山,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密、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八月条。“开元中,回纥渐盛。有九姓部落……每一部落一都督。后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有十一都督,九姓部落,一部落置一都督,于本族中选有人望者为之。破拔悉密及葛逻禄,皆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每行止战斗以二客部落为锋。”《唐会要》卷98《回纥》。
- ⑦“(大历九年774)十二月,追赠九姓回纥宰相曹密栗亡妻石氏为岷国夫人。”《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顿莫贺可汗“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 ⑧“内外宰相中除了随庞(勒)特勒西迁之宰相职叙另拥喝没斯、那顿噶南下之宰相赤心、仆固以外,其余六宰相皆拥乌希特勒为可汗,其动因显然是出于国难当头,宜立长不宜立幼的非常考虑,乌介可汗由得立,但回鹘汗室却因之分裂。”薛宗正《回鹘南迁考》[J],《西域研究》,1997,(4)。
- ⑨李符桐先生认为:“回鹘为龙沙之族,其统一漠北,胥赖其辉煌武功,然所统诸部,均各保持其半独立状态,统治力强固能用自如,统治力弱则叛乱即起。……若干部落,各有一种自立职权,则其谓为一种帝国,毋宁谓为一种联邦。当其最高可汗权威欠缺之时,旧有部族之争即起……”李符桐《回鹘史》,《李符桐全集(二)》,台北:学生书局,1992:71。
- ⑩“是岁,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所毒死,可敦亦仆固怀恩之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国人共杀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噶嗣。迦斯还,可汗等出劳,皆俯伏言庆立状,惟大相生死之。悉发郭锋所赐器币饷迦斯。”《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作者简介:马军(1977-),男(藏族),青海西宁市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2006级专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林欢(1976-),男,天津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方向:中西交通史。

难题,该难题不解决,“国难不已”!梁启超将彻底变革中国政治的希望建立在国民素质整体提高基础之上,但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他认为通过有识之士的努力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具体地说,梁启超的‘政治革命’主要有两大方针:一曰劝告,二曰要求。所劝告者在开明专制,所要求者在立宪。那么怎样完成劝告、要求呢?梁启超认为首先必须以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为政治目标,做到有的放矢,得此则止,不得勿体。其次,围绕这些内容,向中央政府谏议,要求并适当加以督责。……假如劝告、要求不行,可以对政府加以相当的惩罚,甚至不排除‘暗杀’方式,但是,这种惩罚只是为了提醒政府,而不是暴力,这种‘暗杀’方式只是对付个别‘冥顽不灵’统治者的‘最后之武器’,绝不可滥用,更不能流化成暴力或革命”。不难看出梁主张以和平手段变革,辅之以暴力手段,基本上是“立宪派”的主张。梁在两派间徘徊许久后,最终成为了“立宪派”的旗手。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梁启超文集·致康有为书(1899年夏秋)》[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2]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少年中国说》[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3]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2):132。
- [4]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5。
- [5]梁启超《梁启超文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6]梁启超《梁启超文集·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7]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2):133。
- [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6。
- [9]李平、杨柏林《梁启超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104。

作者简介:洪洪涛(1974-),男,江苏沛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0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社会比较研究;刘军(1971-),男,河南沁阳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0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